

第一章

落後者

本章旨在驗證全書中反復闡述的一個論點：由於沙皇俄國和中華帝國的落後狀態，革命黨人一開始不得不用全副精力來清除障礙。他們必須徹底鏟除落後狀態和極端貧困，才能夠開展真正的重大任務，即在全世界伸張正義。我們常看到的豪言壯語是「使人類脫離史前時期」，但這句話也恰恰表明，俄國和中國後來走上歧路和偏離正軌，並非只是落後這個因素單獨造成的。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史前時期不僅普遍存在於無可救藥的專制國家，也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包括「先進的」西歐國家。這些革命黨人雖然崇尚西歐的技術和文化，但他們認為這些技術和文化仍然脫胎自同樣的史前時期，不管它是資本主義時期，還是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時期，所以都迫切需要把受剝削的窮苦大眾從史前時期解放出來。

俄國和中國除了同樣幅員遼闊之外，相同之處極少，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落後。兩個國家雖然大不相同，它們的現代化過程卻都是起步較遲，而且都只取得部分成功，這導致在兩國出現一系列相似的進程、做法和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儘管革命的起點非常不同，但革命一旦爆發，都會產生相似的效應。

俄國在地理上與「比較先進的」歐洲靠近，部分由於這個原因，俄國人對他們國家的落後狀態體會比較早，了解也比較深刻，儘管他們落後的程度不像中國那麼怵目驚心。這種了解使得彼得大帝以降的俄國人寢食難安，促使他們首先從軍事入手，致力現代化，並一直持續到下一個世紀。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1854–1855），俄羅斯軍隊是由騾馬車隊經由

泥濘的道路運送給養。半個世紀之後(1904–1905)，交通運輸的規模不一樣了，但情況仍然同樣落後，使得俄國的陸軍和海軍再次一敗塗地，只不過這次沒有敗在英國人或法國人手裏，而是輸在日本人手裏(小日本人打敗了白種人!)。克里米亞戰爭的教訓，至少讓亞歷山大二世開始進行重大改革並鼓勵建設第一個工業項目。另一方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42)，英國派出一小支遠征軍就輕易取得勝利，中國卻沒有引以為戒。半個世紀之後(1895)，中國再次慘敗，遭受的羞辱只有俄羅斯海軍於1904年在對馬海峽的慘敗可以比擬，而戰勝者同樣是那個被中國人視為缺乏教化的日本「倭奴」。這次慘敗終於使少數開明的中國愛國志士認識到自己國家落後的程度，覺得發奮圖強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經濟發展遲緩造成的社會影響

中國由於在1895年戰敗後向日本割地賠款(也因此向其他幾個國家賠款)，於是步履蹣跚地在少數幾個對外通商口岸開始工業化。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民族工業由於少了外國競爭而突飛猛進，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工業化，一直延續到1920年代，甚至或多或少延伸到1930年代。不過，儘管中國的革命黨人在1949年繼承的工業基礎規模不算小，但與俄國工業在1861到1914年期間、尤其是在1890年之後的驚人進展相比，仍然相形見绌。

俄國的工業生產在半個世紀期間(1860–1910)增加了十倍以上，這個增長率是維多利亞英國的四倍，也稍稍優於日本的增長率——日本與俄國的比較更值得注意，因為兩國都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俄國剛剛廢除了農奴制度(1861)，明治維新也方才起步(1868)。俄國的迅速增長造成社會深度動蕩，破壞了老大農業帝國的穩定，卻沒有縮小它與其他「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1913年，俄國生產的煤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半個世紀期間也增長得比較慢，在1860年約為美國人均國產總值的40%，但到1913年只佔24%。¹

雖然俄國的工業化遠比中國後來（1895–1937）開始的工業化亮眼，但這對難兄難弟卻都是「後來者」，具備了一些共同特徵：工業分布集中，大部分都在聖彼得堡和和上海；手工業者和作坊竭力抗拒，它們與集中的現代工業不同，零星分散在各地；工業設備陳舊，大多是從外國進口（俄國是從德國進口，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損失慘重）；資本短缺，因此俄國不得不從國外（主要是從法國）借款，而中國的企業因此無力與外國企業平等競爭。最後，工業增長由於國內需求疲弱而欲振乏力，因為農民非常貧窮；俄國和中國的農民在革命爆發前夕都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

中俄兩國都是農業國，勞動人口大半仍是農民，但農業生產停滯不前。農業工具原始，技術老舊，肥料的使用量有限，使得農業生產乏善可陳，遠遠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農業。中國的產量低，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口眾多，農家的耕地窄小。中國的老話是「人多田少」。俄國的人均耕地雖然大得多，但氣候惡劣，耕作期短；這些耕地不久就集中於中央黑土區，那裏的人口密度相當於法國農村，但產量只有法國的一半。1863至1897年，歐陸俄羅斯的農村人口從5,500萬增加至8,200萬，到1914年超過了一億。

雖然農村外移人口逐年增加，但這在農村每年增加的人口中僅佔一小部分，而農民渴望土地，不耐煩等待地主土地的「黑色重新分配」（black repartition）。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口號是從蘇聯顧問那裏聽來的，源自俄國農民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國與1917年俄國中部的情况不同，不存在那樣的階級仇恨，但中國共產黨聲稱農民苦大仇深，一心嚮往革命；階級仇恨對中國農民來說其實相當陌生。

中國農民從來沒有想過要覬覦富人的土地，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天生窮命，或至少是由其祖先甚至他們的前世就已經注定。不過，他們與俄國農民一樣，感覺與國家、「外來者」、寄生的城市 and 任何特權人士毫不相干，認為這些人到農村是要威脅或掠奪他們。中國與俄國一樣，廣大農民與社會脫節，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在沙皇專制政府和中國皇帝統治下，政府的權力沒有滲透到農村（這種情況在1928到1949年

民國時期的最後20年稍有改善)。因此，中國的鄉和俄羅斯的村社(Mir)²都享有相當多的自治權。不過，這種自治並不是民主，因為鄉和村社的一切都掌握在少數幾個「長老」手中。這些人由比較富裕家庭的男性家長組成，毫無例外地生性保守，遵循陳規舊俗。這種家庭在中國長城以南稱為家，從白俄羅斯到烏拉爾山脈等地稱為dvor，都是父權至上的宗法體制，掌握着家族的共同財產，雖然已婚的男孩也有發言權。

父權所反映的是沙皇或皇帝的權力，也反映了東正教或民間流行的道教的權力。兩種宗教儘管不同，但都不會挑戰主流教條、傳統價值或既有秩序。除了學者和貴族，整個社會相當整齊劃一。由於生活艱難，人民彼此之間的關係密切，很少離開家鄉，一旦背井離鄉外流到了城市，對自己的家園仍然念念不忘。從外表看去，這種社會似乎單純而停滯不動，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只是演變的步伐很慢，與現代社會相比顯得僵化不變。它具有傳統社會的特點，強調整體、綜合的價值，就是把個人置於無所不包的全體之下，個人只能作為全體的一分子或作為棋盤上的卒子發揮作用。

可是，這樣的社會逐漸崩潰，現代化速度比較快的俄國尤其如此。貨幣經濟一步步滲透到農村，農民開始使用新的技術，鐵路、公路、郵政和電報把全世界向農村開放。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取得了進展——中國仍然在蝸行牛步，但俄國的步伐相當快速，它在1897年每五人中只有一人識字(21%)，到1913年每五人中已有二人識字。1878到1914年，小學數目增加了六倍(從25,000所增加到150,000所)，農家的學齡兒童超過半數入學讀書。⁴

年輕人受教育之後開始擺脫父權的束縛，有些人離家去城裏謀生。家庭解體，1860年時，家庭的平均成員數目是九人，到1900年減少到五人。

中國遠比俄國「落後」，⁵中國農民比俄國農民窮得多，但兩個帝國朝着現代化急起直追的努力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華帝國在最後十年雄心勃勃地開始改革，包括建立現代軍隊，支持工業發展，派遣數千名

學生到日本留學，以及廢除科舉制度。那次的改革幾乎與幾十年後鄧小平推動的改革一樣激進大膽。在二十世紀的開頭和結尾的那幾年，都想徹底擺脫停滯落後和僵硬教條的沉重束縛。

不幸的是，走向現代化的努力，就如斯托雷平 (Pyotr Stolypin) 在當時進行的改革一樣，姍姍來遲。斯托雷平那時要求給他20年時間來實現改革，但他在1911年遇刺身亡，改革因此無疾而終。更重要的原因，改革因為戰爭而無法實施，因為革命而結束。可以比較的地方還不止這些。沙皇朝廷讓斯托雷平改革（卻又沒有完全放手），是因為日俄戰爭的慘敗和1905年的革命，而且1907年選出了比較聽話的議會 (duma)。中國的情形類似，滿清朝廷開始改革，是因為北京的外交使團被圍，外國聯軍前往解圍，造成清軍大敗（慈禧太后以為可以依靠義和團，毫無勝算之下逕自於1900年6月21日向各國宣戰）。滿清朝廷迫不得已宣布的改革其實與三年前半途而廢的改革十分相似，但那次改革由於皇帝被迫下台而告終。百日維新（1898年6月到9月）的失敗，以及李鴻章等開明官員先前對工業發展的支持，與維特 (Sergei Witte) 總理的改革類似，都因為朝廷1900至1901年、1904至1905年在戰場上的慘敗而結束，但維特的改革規模更大，成績也比較突出。

工業在1890年代迅速增長，並在1908到1914年期間繼續發展，從而產生了無產階級，這些無產階級與僱用他們的工業一樣，集中在幾個城市。這些新出現的工人剛剛離開農村，還沒有切斷與故鄉的聯繫，常常回家幫忙收割。不過，他們不久就在城市的貧民窟或郊區定居下來，熟悉了曾使他們迷惘或震驚的環境，最終在城市裏與家人團聚或結婚成家。這些工人的第二代對農村生活已經毫無所知，但第一代的移民工人別無選擇，不得不徹底改變自己的信仰、觀念和精神狀態。許多人從此拋棄了與農村的封閉和停滯有關的任何事物。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中國農民也經歷了同樣的背井離鄉痛苦，但也有人因為在上海或天津找到了工作，感到獲得了自由解放。他們在重複聖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先行者的經驗，儘管他們對先行者毫無所知。史密斯 (Stephen A. Smith) 寫道：「在地球上西方世界以外的兩個地區出現和發展出工人階

級」，產生了「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儘管「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因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不同而異」。⁶

據我所知，除史密斯以外，還沒有任何學者根據第一手資料對中國和俄國的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進行研究，⁷因此我要在這裏簡單介紹一下他的看法和結論。兩個無產階級的形成地點都集中在幾個城市，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表明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儘管它們之間存在重大區別。聖彼得堡和上海在本國都不是典型的城市，代表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未來的發展，也預示了整個國家的未來走向。有鑑於此，也因為兩國仍然保留着不久前才脫離的許多過去的面貌，並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這樣的發展。果戈理 (Nikolai Gogol)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譴責在首都裏發生的罪惡，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認為上海的存在是公然違反儒家倫理。上海甚至比聖彼得堡更惡劣，象徵着消費者社會、金錢誘惑、你死我活的競爭、以及年輕人無視傳統的活力和暴力。不僅如此，這種外來的現代化破壞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帶來「國際化的」生活習慣。在上個世紀初，上海尤其體現了這種矛盾現象，令期盼着現代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痛苦：中國要怎樣現代化才能保存它的民族性？文化的「西化」是否不可避免？

農民背井離鄉成為工人的地域不同，由此產生的兩個工人運動也很不一樣。史密斯認為，「具有階級意識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1925年席卷中國，意味着把工人運動置於全民族的反帝鬥爭之下。俄國的情況不同，真正的階級意識早一個世代之前就已經產生。當然，俄國工人們有時候也會像在中國的那樣，參加共同的鬥爭，但只從鬥爭的對象（沙皇專制/內部敵人）就可以看出，兩國工人運動的鬥爭方針是不一樣的。這種差別並非當事人的主觀選擇，而是反映了根本不同性質的客觀環境：中國是「半殖民地」，不斷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俄國則側身歐洲列強的合縱連橫之中。除了殖民主義，還有黃禍論的種族主義，中國的近鄰日本最終成為更危險的帝國主義。俄國人的反西方情緒也屬於不同性質，因為俄羅斯人雖然與西方人一樣是白種人，但斯拉夫派及其追隨者對西方人非常批判和懼怕。